



# “三教”协同创新的政策演变、实施困境及对策建议

席波<sup>1</sup>, 刘美心<sup>1</sup>, 曾珍<sup>2</sup>

(1.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社会职业与职业教育研究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2.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质量管理与教学督导处,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 加强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与继续教育(简称“三教”)协同创新尤为迫切。这不仅是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必要条件, 也是实现教育强国目标的重要课题。然而, 当前“三教”协同创新面临诸多困境, 包括社会认知偏差、协同制度不全、教育资源共享程度低以及数字化水平不高等问题。鉴于此, 提出应加强“三教”协同价值认同, 系统优化“三教”协同创新机制, 构建资源共建共享平台以及打通人才成长通道等策略, 以期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三教”协同创新发展路径。

**关键词:** 职业教育; 高等教育; 继续教育; 协同创新; “三教”协同

中图分类号: G71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931X(2024)05-0005-008

DOI: 10.19899/j.cnki.42-1669/Z.2024.05.001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 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 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 明确并拓展了“三教融合”协同创新发展空间<sup>[1]</sup>。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以下简称“三教”)统筹协调发展、协同创新, 是新时代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举措, 也是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柱。

“三教”协同创新发展作为一项系统工程, 深刻诠释了教育强国的必然发展路径。它不仅与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相契合, 更凝聚了人民对现代教育价值、教育公平的深刻思考, 以及对个体全面发展

所寄予的厚望。本研究计划从“三教”协同创新的概念界定入手, 详细探究其政策演变过程, 深入剖析实施中所面临的困境,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 一、“三教”协同创新的概念界定

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与继续教育在教育类型和目标上各有不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所称职业教育, 旨在培养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 使学习者具备从事特定职业或职业发展的所需素质, 包括职业道德、科学文化与专业知识, 以及技术技

收稿日期: 2024-08-10

基金项目: 2023年武汉职业技术学院校级课题“‘三教’统筹协调发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项目编号: 2023YJ072)。

作者简介: 席波(1969—), 男, 湖北安陆人,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社会职业与职业教育研究院院长, 教授, 研究方向: 职业教育教学管理; 刘美心(1991—), 女, 湖北武汉人,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社会职业与职业教育研究院助教, 研究方向: 职业教育信息化; 曾珍(1984—), 女, 湖北荆门人,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质量管理与教学督导处讲师, 研究方向: 职业教育质量管理。

能等综合素质和实际能力。职业教育包括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sup>[2]</sup>。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为教育类型,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教育是在完成中等教育后实施的,特别是在学院或大学提供的教育。继续教育则专为在职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提供深造机会,以更新其专业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国家鼓励发展继续教育,促进不同类型学习成果的互认与衔接,推动全民终身学习。

“三教”协同创新并非新提法,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有三教统筹的概念<sup>[3]</sup>。当前,学界针对“三教”协同创新的研究,已形成了多维度、深层次的探讨框架:一是立足于教育体系内外协同,强调教育体系内部革新作为推动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协同的策源<sup>[4]</sup>;二是从方法论视角出发实现“三教”融合的超额效应<sup>[5]</sup>;三是从资源共享与机制维度,聚焦于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体制机制的创新<sup>[6]</sup>。四是从人口宏观形势来看,“三教”协同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旨在回归人的本质价值,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sup>[6]</sup>。

根据德国专家赫尔曼·哈肯(Hermann Haken)的协同理论,当各个子系统通过相互协调、合作与同步的方式运行时,所产生的协同效应将显著超越任一子系统单独运作所能达到的效能<sup>[7]</sup>。本研究提出“三教”协同创新,是指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内部子系统,在政府、学校、教育界、企业等主要创新要素共同作用下,各子系统相互协调、融合共生使其协同效益远大于单独个体运作的增值创新模式。

在国家层面,“三教”协同创新强调通过分层竞争机制提升整体教育质量,各类教育系统在相对公平的条件下展开竞争,同时通过协同合作,共同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不仅能够优化教育资源的利用,还能实现不同教育类型间的平衡与提升,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进而增强国家的人才储备和整体竞争力。

在社会与个体层面,“三教”协同创新旨在消弭教育类型间的价值偏见,缩小社会认知鸿沟<sup>[8]</sup>。个体因此能享受多元教育路径,满足个体全方面发展。

## 二、“三教”协同创新的政策演变

作为深入理解客观实体发展进程中内在规律

与历史必然性的核心视角,历史逻辑着重审视客观实体内外部各要素相互作用机制<sup>[9]</sup>。为厘清协同创新的历史逻辑,本文将其嵌入中国教育改革发展脉络之中,回溯并剖析我国在不同历史阶段“三教”协同创新政策的演变轨迹。

### (一)分离发展:自成体系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基本独立发展,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协调机制,政策引导和制度保障相对薄弱。当时,国家教育政策主要服务于国家重建和经济发展需求,尚未形成统筹协调的政策框架。

建国初期,各项事业百废待兴,面对高达80%以上的文盲率,我国政府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和政策,逐步促进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以及成人教育(继续教育)的发展。1951年,《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的实施,象征着成人教育(继续教育)、中等专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逐步构建,教育体系初步形成规模<sup>[10]</sup>。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逐步建立起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且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并强调“学校教育和校外、校外教育并举”。此文件将成人教育(继续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sup>[11]</sup>。1987年,国务院批转《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成人教育(继续教育)与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

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了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与继续教育的未来发展目标。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则在法律框架内深化了“三教”协同创新的战略考量,明确提出“推动各级各类教育均衡并进,致力于构建并完善终身教育体系”的合法性要求。

### (二)沟通衔接:初步融合阶段

21世纪初,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标准,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也推动了文化需求的增加。对此,国家逐步重视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的衔接,尤其在19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出台多项政策文件,初步奠定了“三教”协同发展的基础。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应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教育内在规律的教育体系,实现不同类型教育之间的互通和衔接,逐步完善终身学习体系。

在2007年发布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十一五”规划纲要》,以及随后的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我国政府持续强调了促进不同类型教育间衔接与沟通的重要性。这一理念在“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期间得到了进一步深化,明确提出了搭建终身学习“立交桥”。

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对职业教育的培养层次、培养目标进行新界定,重新划分了我国的教育体系,首次提出“探讨本科层次、研究生层次的职业教育”,促使职业教育不再是“断头教育”“次等教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旨在构建一个与发展需求相契合、产教融合深入的职业教育体系。该规划力求实现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的无缝对接,同时推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在这一阶段,原本代表“精英教育”的普通高等教育正逐步向大众化转型,而成人教育(继续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补偿性功能则在逐渐减弱。此举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准的教育体系开始崭露头角,其中“三教”——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之间的纵向衔接与横向沟通格局正逐步形成。

### (三)统筹协调与协同创新:全面发展阶段

自2017年起,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迈向了高质量发展阶段<sup>[12]</sup>。为适应这一变化,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应运而生,其中正式提出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的构想。同年,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进行了修订,确立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作为两种不同教育类型的地位。

以十九届四中全会为新起点,党中央在统筹协调发展机制问题上,进一步强调了“三教”之间的关系应从“沟通衔接”向“协调发展”转变。这一转变不仅要求教育要素之间实现动态平衡,还强调优化各类教育的内部结构与质量,从而实现教育系统的整体最佳质量。

到了2021年,中办国办发布了《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加快建立“‘职教高考’制度”,以进一步推动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在此指导下,各地纷纷加快推进“职教高考”的实施工作,目前已有28个省份组织了“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考试。然而,全国范围内尚

未形成统一的“职教高考”制度<sup>[13]</sup>。

2022年,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提出了“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的重要论断,这一提法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更标志着我国“三教”关系正式迈入了“协同创新”的全新阶段。

回顾“三教”历史沿革,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经历了“分离—衔接—协同创新”三个阶段。“三教”协同创新的政策演变路径,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内在协调统一,二者互为支撑、相互促进。国家通过立法和改革,不断引导和推动教育发展的重心由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当下中国初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面向未来的“三教”协同创新之路。

## 三、“三教”协同创新政策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

### (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内在需要

推动“三教”协同创新政策不断演变的核心驱动力,源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求。中国式现代化,历经了经济现代化的初步探索阶段,奠定了“四个现代化”的坚实基础,如今正阔步迈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这一进程广泛涉及经济、政治、人口、文化、社会、生态、科技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等诸多关键领域<sup>[14]</sup>。从教育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高度出发,统筹推进“三教”协同创新已成为国家发展的关键环节。该协同机制致力于整合各类教育资源,推动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与继续教育的深度融合与优势互补,从而全面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多元需求。

职业教育,作为直接对接产业链与供应链的教育体系,其现代化进程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向高质量发展、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sup>[15]</sup>。高等教育,作为教育体系的龙头与引领者,展现出鲜明的中国式基因,其现代化发展直接关系到我国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制造强国、工业强国及文化强国建设目标的实现。不仅为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与技术支持,还通过协同创新机制,促进了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与高效利用<sup>[16]</sup>。

“三教”协同创新既能满足人们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全面发展需求,又高效提升了社会劳动力的综合素养。这一创新模式进一步增强了产业链、科技

链和人才链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高度一致,共同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

## (二)破解教育体系割裂化难题的关键

当前,中国正迈向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的重要阶段,亟需深入发掘人力资源的潜能与长处,以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稳步推进。我国教育体系长期存在的条块分割、层次壁垒、各自为营等结构性问题,导致各类教育之间存在梗阻,需要通过协同创新来破解。根据对历年出生率及出生人口数据的详细分析预测,我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在未来至2040年期间将呈现波动趋势。具体来说,从现在到2028年,适龄人口将持续减少,预计最终将降至约8000万。而从2029年到2034年,适龄人口将出现增长,预计在2034年达到峰值,约为9100万,这与2019年前后的适龄人口数量相当。但从2035年开始,适龄人口将再次进入下降通道,预计最终将跌破8000万<sup>[17]</sup>。

因此,单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来看,高等教育普及化在规模发展上的需求已不再是主要矛盾。其他层级教育的主要任务已转变为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这为“三教”协同创新奠定了基础。同时,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劳动力市场正逐渐从以普通劳动力为主转向以专业性劳动力为主<sup>[17]</sup>。这一转变对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从系统论视角审视未来教育改革,推动“三教”协同创新,成为推动教育供给侧改革的有效途径,是释放和提升人力资本潜能的关键手段。

## (三)社会发展与人才需求的动态适应

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科技、教育和人才成为未来发展的核心支柱。这种三位一体的关系要求我们在推动改革时进行系统性谋划和协调布局,确保教育、科技和人才三个方面的改革相互配合与协调发展。

为此,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需要具备前瞻性,不仅要在学科建设中继续强化基础科学研究和推动交叉学科的发展,还应发挥“人才蓄水池”的作用。职业教育则需紧密贴合市场需求,不断调整专业与课程设置,强化实践教学与职业技能培训,为经济社会发展输送大量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继续教育作为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拓宽教育途径,为在职人员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机会,助力其技能升级与职业转型,满足教育的需求。通过“三教”的协

同创新,可以实现高效的教育资源整合,发挥1+1+1大于3的效果,以动态适应社会发展和人才需求的变化。这种协同机制将推动教育体系更加灵活和响应迅速,为国家在全球竞争中赢得先机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 (四)经济与教育发展的同频共振

经济与教育同频共振,主要体现经济与教育相互作用,内在统一。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得到了显著优化,经济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也得到了极大提升。这一过程中,教育事业也同步取得了长足进步,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显著提升。

从供给侧视角分析,教育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优化产业结构以及推进技术进步,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sup>[18]</sup>。具体而言,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得以提升,能够更好地适应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业的需求,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同时,教育系统培养的大量科研人员和技术专家为技术革新和技术进步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从需求侧视角分析,教育通过增强消费能力、优化消费结构以及增进资本投资,进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sup>[19]</sup>。在人口结构问题上,已有研究表明,教育促进了人口老龄化并提高了人口抚养负担。尽管教育可以解释人口结构的变化,但它并未加剧由此产生的经济压力<sup>[20]</sup>。通过提高劳动力质量和增加老年人社会贡献度,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负担。

“三教”协同创新的发展模式,体现教育与经济的深度融合,也为解决我国经济、人口、社会等多方面内部问题提供一条重要途径。

## 四、“三教”协同创新实施难点和困境剖析

### (一)社会认知的偏见壁垒

一是对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的认知偏差。普遍看,高等教育的社会认可度明显高于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这一价值认同鸿沟广泛渗透于社会各个层面。其外因深植于历史传统的桎梏之中,同时也折射出公民终身学习的权利观尚未形成。选拔制度加剧教育“内卷”,教育功利主义倾向明显,这一顽疾难以从根源上消除<sup>[21]</sup>。不仅削弱了劳动价值的社会认可度,还抑制了各级政府部门在推动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上的动力与执行力。就内因而言,职业教育属于普惠性、基础性、兜

底性的民生工程,职业教育在政府部门的引领、行业企业的参与、职业学校师生的认同等层面上,与国家赋予的使命尚存差距<sup>[22]</sup>。鉴此,达成“三教”(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发展的社会共识尤为迫切。

二是协同创新意识不足。长期以来,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与继续教育各自独立运行,形成了相对封闭的发展格局,缺乏深入且系统化的沟通与合作机制。此种分隔状态不仅导致了教育资源的低效配置与冗余建设,还制约了教育综合效能的充分释放。尽管国家层面已积极倡导“三教”融合与协同创新策略,但在实践层面,由于各类教育机构间利益诉求的差异性,协同创新的内在驱动力不足,难以构建起高效协同的合作框架。

具体而言,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与继续教育在课程体系构建、资源开放共享、人才培养路径创新等关键环节上,缺乏统筹规划与协同布局,合作意愿的薄弱与行动力的欠缺,进一步加剧了创新进程的迟缓,不利于教育整体创新生态的营造与优化。

## (二)“三教”协同创新的制度壁垒

近年来,我国的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在运行中仍面临体制机制问题,亟须改革完善。

一是管理体制不顺。尽管在教育内部“三教”已经基本实现了归口管理<sup>[13]</sup>,但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仍由不同部门分别管理,导致统筹管理和协作面临困难。具体而言,职业教育通常由教育部门、人力资源及社会保障部门等共同管理,其中职业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分属不同的部门。高等教育主要由教育部门负责。继续教育则涉及教育、劳动人事及行业主管部门等多个部门。这种多部门、多层次的管理体制在实际操作中导致信息不畅、职责不明、权责不对等问题,难以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与共享。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也往往缺乏统一性和协调性,导致劳动制度与教育制度,职业资格证书与学历证书之间存在各行其是的制度壁垒和体制障碍。

二是办学体制不活。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的办学体制相对封闭,灵活性不足,难以满足社会和市场的多样化需求。大多数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机构仍以传统的公立办学为主,缺乏多元化的办学主体参与。在这种办学体制下,社会资本、企业和社会组织等难以有效参与办学,导致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人才培养方

式等滞后于社会需求。校企合作的机制不完善,难以培养出既具备理论知识又具备实际操作技能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三是评价机制不完善。当前,存在的首要问题是“分流”制度亟待全面评估和完善,分类标准尚未健全。这种现状导致招生规模、结构及层次布局难以实现最优配置,从而影响人才选拔的多样性与公平性。其次,职业教育在适应性发展路径上尚不明晰,培养标准体系存在不统一、不兼容的现象,同时,产教融合的深度和广度不足,难以有效支撑高质量人才培养的需求。最后,融通机制急需完善,学分互认、学籍互转及资格互认的科学标准与操作机制的缺失,构成了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与继续教育协同创新的核心障碍。

## (三)资源共享壁垒

一是面临结构性壁垒。我国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在资源共享上面临结构性壁垒。在投入方面,普通高等教育的资金支持明显高于职业教育。虽然高职高专学校在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中所占比例有所增加(从2007年的2.81%上升到2019年的3.98%),但与普通本科高校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后者的占比从16.50%提升到17.07%。从全国范围来看,高职高专学校获得的经费不到普通本科高校的四分之一<sup>[23]</sup>。

其次,职业教育因“学术漂移”倾向模仿普通高校的管理模式,忽视了自身的类型特色;而继续教育则受限于生源、师资及经费,常沦为附属品<sup>[24]</sup>。此外,东部地区在“三教”协同发展方面普遍领先于中西部地区,这种区域发展不平衡进一步加剧了资源共享的障碍。

同时,“三教”之间长期处于割裂状态。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缺乏有效沟通,尤其是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之间的联动不足,导致职业院校在满足高技能培训需求方面能力有限。高等教育与继续教育衔接不畅,继续教育在现代教育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

二是师资队伍建设滞后。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及继续教育在师资建设方面长期缺乏有效协同。职业教育需要具备实际操作能力和丰富行业经验的“双师型”教师,目前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还需提高。同时,职业院校的师资培训体系和制度尚不健全,无法满足“双师型”教师发展的需求。

在高等教育领域,教师需要具备深厚的学术背

景和科研能力。虽然高等职业教育教师在近几年有所改善,但与普通本科教育教师相比,其在学术素养、科研资源、高水平平台的利用、科教前沿以及数字素养等方面仍显不足,制约了职业教育的科教融合和高质量发展。

继续教育则需要具备信息技术能力的教师,以适应线上与线下混合教学模式的需求。不同教育类型师资的培养和继续教育机制尚待完善,这限制了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间的“三教”协同创新效应。

三是数字化建设不足。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在数字化建设上均显不足,尚未构建出高效的信息化平台以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与利用。现存的教育门户和平台各自为政,数据标准与接口纷繁复杂,导致资源整合困难,协同应用难以实施。这种局面限制了优质教育资源的自由流动与广泛共享,降低了资源的利用效率,不利于教学方法的相互借鉴与资源的深度融合。

在教学方法层面,职业教育以实践实训为重心,致力于提升学生的实践操作与复杂问题解决能力;高等教育则更侧重于学术训练,以专任教师的课堂讲授为主导,其考核体系更偏向于理论深度与学术性探究;而以开放教育为典范的继续教育,则主要依托信息技术进行教育教学活动,如线上授课、直播辅导等,但在实践实训方面仍面临设备和资源限制、实践指导困难、互动性不足、评估挑战等问题。为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升教学质量,各方应共同努力,推动数字化建设的步伐,实现教育资源的互联互通与高效利用<sup>[25]</sup>。

## 五、对策建议

### (一)加强“三教”协同价值认同

一是加强立法与价值引导。为加强社会对“三教”协同价值的认同,核心措施是在法律层面确保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协同创新发展与中国的法治建设同步推进。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应着重普及全民终身学习的价值观念,扩大并创新继续教育相关机构的服务。通过数字政府建设,加强对终身学习理念和前沿政策的宣传。例如,利用新媒体,通过设立专岗专员等方式,在电视节目、纪录片、抖音、微信、学习强国等社交媒体平台上推广“三教”的知识和理念。

此外,各级政府可以定期举办继续教育博览会

或终身学习周,展示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的成果及发展规划。更为重要的是,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需要增加适应性,与高等教育深度融合,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是消除偏见并重塑国民价值认同的关键。

二是要增强协同创新的意识和行动力。为此,相关部门应组织关于“三教”协同创新的培训,举办跨部门、跨领域的协作研讨会,帮助不同类型和层级的相关人员了解国家教育改革前沿动态,及时更新教育理念。通过培训和研讨会,加强实践中的沟通交流,从而提升协同意识,逐步形成统一的协同价值观。此外,政府可以设立专项基金或补助,以鼓励各教育层级进行跨领域合作与创新,从而有效地将协同意识转化为实际行动。

### (二)构建“三教”协同创新制度

一是强化统筹管理机制。要实现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的有效管理,首先必须强化统筹管理机制,打破部门壁垒,构建多方协作的管理框架。

第一,在中央层面建立统筹“三教”的指导委员会,负责顶层设计的制定、监督执行、管理协调以及地方政策制定的指导与规范;在地方层面建立相应的“三教”统筹行政部门或办公室,负责区域内“三教”协同发展的具体事务,构建省级层面的协同培训体系框架,推动中央各项政策细化落地。

第二,加强政策协同。各部门应共同制定涵盖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的长期发展规划,确保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中不相互冲突。同时,应该完善跨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实现教育、行业、企业等多方数据资源的整合,提高政策实施的精准度和针对性。

二是构建“国家资历框架”。首先,法律保障是基础。应出台终身教育法、继续教育法以及资格框架条例等配套法律,为国家资历框架的建立提供法律支持,确保其权威性和可执行性。

其次,明确资历标准是核心。国家应制定全面的资历框架,涵盖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各个层次,并详细规定课程的学分标准和能力要求。这个框架须透明公正,以保证不同教育形式的学习成果能被公平对待和互认。例如,职业教育所获得的学分应在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中得到认可,同时,继续教育学员的学习成果也应能用以申请职业资格证书或学位证书。

推动学分互换与资历互认是关键环节。国家资历框架应支持学分互换,确保职业教育的学生可以将所学学分转换为高等教育学分,或申请学分抵免。同样,继续教育学员也能将其成果与职业或高等教育的课程衔接,提升学习效率并缩短学时。

最后,除了学分转换,需推动不同教育体系间资格证书的平等互认。例如,继续教育中获得的资格认证应对应国家规定的职称或学历资格,确保其学习成果在不同领域和职业体系中具备相同价值。

### (三)构建资源共享平台

一是要推进教育资源共建共享。随着信息技术与教育发展的深度融合,线上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变得更加便利。为此,应充分利用现有的公共服务平台,如国家智慧教育学习强国平台、中国大学MOOC、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等。通过进一步完善技术支持和开放优质资源,全面提升线上教育资源的质量。这将打破地域、行业和教育层次的限制,构建一个多方参与、共享共建的教育生态系统。

在此基础上,建议构建“三教”协同数字化资源库,集合各方力量进行“三教”教材资源的建设。此外,为确保资源的有效应用,应针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的不同层级教师,开设专门的数字素养培训项目,提升他们的数字化水平。这样不仅能够更好地支持教学,也能进一步推动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形成良性循环。

二是要创新资源共享模式。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统筹“三教”资源的基础上,做好“组团式”帮扶、“东中西”协作、城乡一体化等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共融共治工作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思路和方法,做优做强“三教”资源共建共享,对欠发达地区、职业教育、继续教育有所倾斜,如教育拨款、优惠政策和教育评审方面提供相应的支持。鼓励发展区域特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

### (四)畅通人才培养路径

一是进一步完善职教高考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职教高考制度,健全“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试招生办法,扩大职业本科招收中职毕业生规模,充分体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地位”。二是进一步扩大长学制衔接培养规模。支持优质中等职业学校与高等职业学校联合开展五年一贯制办学。通过“3+2+2”“3+4”等方式开展中等、高等职业教育与职业本科教育衔接培养。三是扩大普通

本科招收职业院校毕业生比例。扩大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招收职业学校学生比例,高水平普通高校开辟专门通道,给予招收职业院校毕业生和继续教育学生机会。四是拓展继续教育的服务范围与形式。政府应鼓励继续教育机构与企业、行业协会等合作,针对不同行业和职业的特点开发多样化的培训项目。同时,打通继续教育学生的提升通道。通过学习成果认证等方式,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招收继续教育学生提升学历和能力。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22-10-26.
- [2] 中国政府网.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EB/OL].https://www.gov.cn/xinwen/2022-04/21/content\_5686375.htm,2024-09-21.
- [3] 张鹏.对三教统筹的理解[J].成人教育,1989(5):25.
- [4] 王奕俊,王建初,邱伟杰.“三教”协同创新的战略导向、内涵构成和运行机制[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23(5):57-65.
- [5] 胡永.基于协同学的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研究[J].教育与职业,2023(11):21-28.
- [6] 谢清,秦惠民.论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协同创新——基于人口宏观形势的视角[J].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报,2023(3):1-8.
- [7] 赫尔曼·哈肯.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11.
- [8] 邓卓,匡瑛.“三教”协同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J].高教发展与评估,2024(5):22-32.
- [9] 罗建文.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三大逻辑”[J].理论探讨,2018(2):12-21.
- [10] 张力.开拓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可持续发展新局面[N].中国教育报,2023-01-31(03).
- [11] 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5(15):467-477.
- [1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21.
- [13] 周凤华,杜怡萍,李磊.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的现状与推进策略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4(6):3-10.
- [14] 陈金龙.中国式现代化演进的历史逻辑[J].社会科学战线,2024(9):12-19.
- [15] 高明,丁洪宾,杨红霞.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化政策的演进、特征与展望——基于30份政策文本的分析[J].现代教育管理,2024(7):85-96.
- [16] 贺祖斌,卞志国.文化铸魂: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思想力量[J].中国远程教育,2023(8):1-6.
- [17] 马树超,郭文富.走中国特色“三教”统筹协同发展之路[J].中

国高教研究,2023(1):8-13.

- [18] Cinnirella F, Streb J[J].The role of human capital and innova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Post-Malthusian Prussia,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17(2):193-227.
- [19] 闵维方,余继,吴嘉琦.教育在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J].教育研究,2021(5):12-22.
- [20] 管振,孙志军.教育对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J].中国软科学,2024(6):79-89.
- [21] 兰岚.中国式终身教育法治现代化的实践难点与行动策略

[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23(4):31-38.

- [22] 郭英蕊,李妍.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与吸引力[J].人民论坛,2024(14):61-63.
- [23]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发展规划司.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20[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 30-34.
- [24] 陈凤英.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缘由、困境及行动路径[J].教育与职业,2023(20):28-33.
- [25] 江颖,刘述.统筹“三教”视域下专业教育协同创新的实践困境与行动方略[J].教育与职业,2024(18):35-43.

[责任编辑:向 丽]

## Policy Evolution, Implementation Dilemmas, and Countermeasure Suggestions for “Three Educations”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Xi Bo<sup>1</sup>, Liu Meixin<sup>1</sup>, Zeng Zhen<sup>2</sup>

- (1. Wuhan Polytechnic, The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 and Voc. and Tech. Education, Wuhan, Hubei, 430074, China;  
2. Wuhan Polytechnic, Quality Management and Teaching Supervision Office, Wuhan, Hubei 430074,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proces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t is particularly urgent to strengthen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shortened as “Three Educations”). This is not only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building a lifelong learning system but also an important topic for achieving the goal of an educationally strong nation. However, the current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the “Three Educations” faces numerous dilemmas, including social cognitive biases, incomplete collaborative systems, low levels of educational resource sharing, and inadequate digitalization. In light of this, this study suggests enhancing the recognition of the value of “Three Educations” collaboration, systematically optimizing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mechanism of the “Three Educations”, and exploring strategies such as constructing a shared resource platform and streamlining talent development pathways, aiming to explore a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development path for the “Three Educations” that aligns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Continuing Educati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Strategies